

#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86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军事战争等重大问题，并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 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术，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食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的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

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 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党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由于电台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撤销了“三人团”，批判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认为“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判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受扼杀了。”

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首要原则。毛泽东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 改变了中国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熟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 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简称“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突围向陕北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瑞金于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进，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济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回忆：“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像周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过度依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不深，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以后，又加了陈云同志。”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当时的职务虽不是最高领导人，但在党和红军最主要的军事斗争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他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同时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又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实际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正如胡绳所言：“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仅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中和军队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源自人民网)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县)、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的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率第一、二、三军团(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日至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二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一、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在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源自共产党员网)



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的资料照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继续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源自人民网)

# 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在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田地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不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小商店应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领手续”。1930年2月，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五军、六军两军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毛泽东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两个结论，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种主张按耕地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及迟迟不分的右倾错误。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不仅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了，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委名义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级政府发布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件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这样，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源自人民网)



#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精神启后人

1889年，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自幼父母双亡，靠祖父教养成成人。1913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锦绣河山。

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的工作。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他发表的《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令李大钊备受鼓舞，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初，李大钊等革命家就开始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李大钊还

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出卓越贡献。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酷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李大钊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源自人民网)

